



中国近代战争史

五

李大伟 编著



目 录

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	1
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1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4
八国联军的组成与清朝军事概况	10
大沽、天津之战	16
北京之战	30
《辛丑条约》的签订	36
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历史意义和失败的原因	40
抗击沙俄入侵东北的战争	45
沙俄入侵东北的准备及部署	46
清朝在东北三省的设防和战备	51
战争经过	53
东北人民继续进行武装抗俄斗争	66
清军失败的原因	71
抗击英军入侵西藏的战争	75
英俄两国对我国西藏的争夺	75
英国的战争准备与西藏的战备设防	80
曲眉仙角、古鲁之战	84
江孜之战	86
拉萨失陷与《拉萨条约》的签订	93
战争失败的原因	95
辛亥革命战争	98
辛亥革命前的国内形势	99
武昌首义成功，全国掀起革命高潮	107
汉口、汉阳保卫战	120
苏浙联军攻取南京和成立中央临时政府	134

辛亥革命战争的经验与教训	142
--------------------	-----

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速了争夺中国的步伐，使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危机。清王朝不积极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反而镇压民众的反帝斗争和救亡图存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1900 年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并阴谋乘机瓜分中国，借口清政府“排外”，纷纷调兵前来中国，进而发动了一场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联合侵华的战争。为了保卫家园，中国军民在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中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

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一、帝国主义在华争夺势力范围

《马关条约》签订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更加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虎视鹰瞵、争相吞噬的一块肥肉。实际上，当 1895 年初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时，帝国主义者就发出了“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的狂叫。随后，“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拚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在行动上“开始瓜分中国了”。

德国政府早就注意到，中国山东的胶州湾“作为港口而论，它在各方面都有重要的优越性”，亟欲占领，

以便建筑海军基地。1897 年 11 月，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派军舰侵占了胶州湾。次年 3 月，又强迫清政府与之订立《胶澳租界条约》，不仅在“租借”的名义下强占了胶州湾，并把山东省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俄国于 1897 年 12 月 15 日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随后，俄国一方面从海参崴（今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派兵来华，以四五十艘舰船在中国海口游弋；另一方面又贿赂李鸿章、张荫桓，诱迫清政府于 1898 年 3 月和 5 月分别与之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及其《续约》。俄国强租旅大后的第二年，竟擅改租借地为“关东省”，不仅霸占我辽东半岛，而且把东北全境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法国于 1898 年 4 月迫使清政府答应租让广州湾，不久便划两广和云南三省为其势力范围。英国以俄、法的扩张会妨碍其在华利益为借口，趁机于 1898 年 6 月 9 日强租九龙半岛及香港附近的岛屿，接着又强租威海卫为军港，并宣布广东和云南的一部分地区及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于 1898 年 4 月胁迫清政府承认福建为其势力范围。美国当时正忙于向中南美洲扩张，无暇东顾，但它并没有放弃侵略中国的野心。1899 年秋，它提出了一个各国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以保持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自由开放，保护其在中国利益。

帝国主义在华夺取势力范围，强租军港，构筑炮台，建立军事基地，控制了北自旅大南至广州湾的许多沿海战略要地，并可将军舰驶抵渤海湾内各重要港口，从而使中国门户洞开，京畿腹心要地也处于侵略者的军事威胁之下。

二、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宗教侵略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首先，它们趁清政府无力筹付对日战争赔款之机，三次强迫清政府以高折扣、重利息向外国银行借了约三亿一千万两白银的外债，加上其它各项债款，共约五亿两白银。当时，清政府每年的收入约八千万两白银，支出约九千余万两，根本无法从国家的财政收入中逐次偿还外债和利息，只得以关税、厘金、盐课作抵押，同时用增加苛捐杂税和发行内债等办法，把财政赤字转嫁给农民、手工业者及中小厂商、中小地主。其次，各国还从攫取的铁路修筑权中获取高额利润。据不完全统计，自 1895 年至 1898 年，被它们攫取的铁路修筑权竟达一万零二百公里之多。同时，各国还通过在华开矿设厂及大量输出商品等渠道，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此外，帝国主义在华设立的银行，也从为其对华商品输出服务，变为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经济侵略中心。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垄断了中国市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国民族工商业受到压抑和摧残，广大农民、中小商人、运输业和手工业工人大批破产和失业。

在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帝国主义还利用宗教作为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各国传教士即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窜遍我国的通都大邑和僻野乡村。到 1900 年，西方的天主教、耶稣教、东正教等，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约四十个教区，六十多个教会，有外籍传教士三千余人，中国教徒八十余万。在帝国主义各国的胁迫下，清政府给予传教士以各种政治特权。他们所到之处，拆庙毁寺，霸田抢房，敲诈勒索，包揽词讼，私设牢狱，无故殴毙贫民。他们还收买地主

恶霸、地痞流氓入教，纵使这些人为非作歹，肆无忌惮地欺凌百姓。还有不少传教士，实际上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无孔不入地刺探中国的各种情报，有的还直接参与策划侵华活动。

据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供认，他对中国内地消息的探知，主要是由于天主教牧师的帮助。更为严重的是，当时许多教堂都拥有武装，有的教堂内甚至藏有数门大炮和几百支枪。对于这些无恶不作的传教士，中国人民无不切齿痛恨，不断掀起反洋教的斗争，并逐步汇集成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的朝政大权再次被泥古守旧的慈禧集团所控制，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不可能指望这样的政府抵御帝国主义的瓜分和侵略，只有自己起来进行殊死的斗争，以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民族的生存。波澜壮阔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今河北）交界地区。它是在义和拳等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不少无业游民。义和团的名称最早见于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次年秋起，清政府在公文中也开始使用这一名称。此后，“义和团”一词逐渐取代了“义和拳”，或与“义和拳”并用。

山东的教会势力极为猖獗，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也就异常激烈。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军事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北地区，群众经过长期酝酿，奋起抗教，终于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发源地。至 1899 年，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冠县一带的义和拳，以及朱红灯、本明和尚（亦称心诚和尚）领导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带的义和拳，已相当活跃，声势甚大。他们在反洋教斗争中相互声援，有力地打击教会侵略势力，使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为之震惊。

长期以来，直隶人民也不断反抗教会的欺压，参加斗争的群众相当广泛。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不时攻打教堂。

义和团兴起以后，提出了许多反帝口号，如“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和“兴清灭教”、“洋人可灭”等等。在斗争过程中，义和团也张贴过反清的揭帖，如“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等。

义和团以宗教和军事合一为其组织形式。基层单位是坛（或称厂、炉、场、团），各坛人数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则五十人或二十五人。几个或十几个坛组成总坛（总团）。各总坛之间互相独立，不相统属。作战时分编为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负责人称哨长（或队长、百长），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设班长（或称十长）。就其总体来说，义和团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指挥机构的松散组织，主要靠揭帖聚会，有事时“传单一出，千人立聚”，事毕即散。青年妇女也有类似组织，名为红灯照，蓝灯照等。她们一般担任勤务工作，有时也参加

战斗。

义和团的总坛首领称老师或老祖师，各坛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大师兄平时掌管坛内各种事务，战时负责领队和指挥作战。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分编哨队各名目。有的义和团还有大元帅、副元帅、大先锋、军师、总管粮台等称谓。其中总办、统领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师担任；前敌、催阵由勇敢能战者充当（作战时他们骑马当先，往来督战）。义和团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并有少量鸟枪、抬枪、抬炮等火器。

义和团有较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扬神道相助，刀枪不入等。但义和团制定的某些团规戒律，如“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毋贪财，毋好色”等，则体现了义和团反对邪恶、反抗压迫、保护善良等劳动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淫威，曾先后多次下令“速为剪除，……实力搜剿”，“切实弹压，毋令滋事”，“从严惩办，以靖地方”。但是，清军的武力镇压，动摇不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决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胜“剿”。于是有些官吏认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势必“激之生变，铤而走险”，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兵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以求民教相安。清政府这种改“剿”为“抚”、被迫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日大，更加有力地打击了传教士和教民的凶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

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10月中旬，朱红灯指挥义和团击退数百名清军骑兵的进攻，后又进至距平原县城仅十八里的森罗殿。不久，朱红灯率众冲出重围，转至茌平。同年11月，朱红灯及本明和尚被清军游击马金叙部逮捕，后在济南遇害。此后，鲁西北地区的义和团在高唐县人王立言等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廷决心把山东义和团镇压下去。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统兵前往镇压。12月25日，袁世凯统率装备精良的七千名武卫右军到达济南。他见山东“民情强悍”，义和团民“所在多有”，便“分布队伍逐处弹压”。至1900年夏初，“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王立言等首领相继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二、义和团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发展

当义和团在山东蓬勃发展时，与山东交界的直隶大名府、河间府等地区的义和团也积极开展斗争，其活动迅速遍及直隶东南各州、县。直隶总督裕禄虽一再调兵镇压，但义和团冲破重重障碍，从1900年春季起，向冀中地区迅速扩展。至4、5月间，保定、清苑、定兴、涿州（今涿县）、新城等地，已成为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地区。

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的义和团围攻正在添枪增炮、扩大反动武装的教堂，邻近的定兴、涿州、新城、易县各地义和团也纷纷前来相助，将教堂焚毁。定兴县的仓巨村也发生类似事件。法国天主教驻北京的大主教樊国梁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清廷命裕禄派兵镇压。

裕禄派练军左翼马队统领杨福同率骑兵前往涞水县高洛村，逮捕和残杀数十名团民，迫使义和团向定兴县撤退。接着，杨福同又率部前往定兴县。5月21日，义和团二三千人在石亭村设伏。22日，清军刚到石亭村外，义和团突然发起围攻，持械猛扑，用长矛将杨福同刺死。5月27日，义和团攻占涿州城，并乘胜继续北上。

为了阻止清政府调兵，义和团先后破坏了高碑店、琉璃河等处的铁路电线，烧毁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芦沟桥等车站，连慈禧、光绪乘坐的“龙车”也被焚毁。清廷急命裕禄饬令直隶提督聂士成“将芦保、津芦两路电线铁道专派队伍妥为保护，毋任再有疏虞”。聂士成命驻保定的武卫前军统领邢长春和杨慕时迅速带兵沿芦保铁路北上，分别驻扎于保定至芦沟桥的大小十七个车站（大站驻一哨，小站驻半哨），企图阻止涞水、涿州等地的义和团北上。由于义和团逼近北京，慈禧紧急调兵加强布防。除调武卫前军加强京南兵力外，又调端郡王载漪的虎神营、庆亲王奕訢的神机营加强京城各门的防御（除永定门加派五营兵力外，其余各门均加二营）。慈禧还命军机大臣荣禄亲率武卫中军至马家堡、丰台一带布防。荣禄以三个营驻防马家堡，五个营驻防丰台。但是，清政府的增兵防堵，阻止不了义和团进入清王朝的心脏北京。

1900年初春，北京城内就有了义和团的活动。开始仅在僻静之处，后来公开在大街小巷传授拳艺，并在交通要道和教堂周围张贴揭帖。6月上旬，京郊各县义和团分批涌进北京。同情义和团的守城士兵，不仅不予阻拦，反而给他们喝道让路。北京居民也积极参加义和团，数日之内，全城设坛千余处。至6月下旬，北京城内的

义和团“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

北京城内义和团的迅猛发展，使清朝统治者极为不安，唯恐祸起肘腋，危及他们的统治地位，不得不采取“因而用之，徐图挽救”的控制利用政策，派庄亲王载勋等总统义和团事务。

6月15日，北京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17日，当慈禧听信载漪等人伪造的列强要勒令她归政光绪的假照会后，她便利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义愤，煽动义和团及武卫后军于20日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但是，慈禧集团不久即玩弄明攻暗保的手腕，一面虚张声势，一面暗中向使馆运送粟米瓜果，为日后议和预留后路。

与此同时，天津义和团运动也在蓬勃兴起。早在1900年2月，天津南门外就有人设坛练拳。6月初，静海义和团首领曹福田、新城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和女首领林黑儿等，率领团众先后进入天津。旬日之间，神坛林立，铸刀之声日夜相继，参加者约五万之众。他们烧毁教堂，惩办贪官污吏，打开监狱释放被捕的义和团员，夺取海关道军械库，用新式武器装备自己。裕禄慑于义和团的声势，也不敢再以武力镇压，便转而采取笼络手段。他对义和团首领以礼相待，请张德成当军师，给曹福田“大令一支，使掌生杀之权，并可调用各兵队”。裕禄此举，既可避免义和团对自己的威胁，又可利用其对付洋人，同时又不悖逆慈禧的意图。而义和团也就在6、7月间，以合法身分英勇地参加了围攻天津租界内的侵略军以及抗击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城的战斗。

八国联军的组成与清朝军事概况

一、帝国主义合谋武装侵华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帝国主义即以此为借口，合谋武装侵华。为了协调侵略行动，美国表示要与英国“同舟共济”，“合力以相助”；英国还以增加财政援助为条件，鼓动日本多出侵略军；日本将此次出兵中国，看作是将来掌握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霸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因而特别积极；俄国则大肆鼓吹“只有列强有力坚决的合作才能制止运动”，它也是派兵最多的国家之一；法、德两国支持俄国的立场。于是，它们很快联合起来，共同进攻中国。

早在1900年4月6日，英、美、法、德公使即联衔照会清政府，要求在两个月内将义和团一律“剿灭”，“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5月30日，英、法、俄、美公使又至总理衙门进行威胁，声称“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的威逼，同意各国调少量兵员来京。5月31日至6月3日，英、美、法、德、日、意、俄、奥等八国以保护使馆为名，先后共派官兵四百四十二人进入北京。

帝国主义为了集中力量镇压中国北方的义和团，并保护其在南方各省的利益，决定采取拉拢南方各省督抚的办法。6月26日，以美国总领事为首的各国领事，同当时在上海的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串联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中心人物）以及上海道台余联沅会商后，订立了所谓《中外互保章

程》。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上海制造局的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不久，四川、闽浙、陕西、山东等省督抚也起而附和。这个章程虽未正式签订，但实际上按此实行。这就使帝国主义侵华枢纽上海以及列强在中国东南各省的利益，不受人民反帝运动的冲击，解除了在北方用兵的后顾之忧；同时，增加了东南各省的独立性，削弱了清政府的权力，大大减少了清政府兵员、粮饷、军火的来源，严重影响了北方清军的作战。

帝国主义各国在协调彼此关系和拉拢南方地方实力派的同时，积极搜集直隶、京津地区的地形、气象、交通、通讯以及清军布防等军事情报，并大量调兵来华，积极进行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

二、八国联军的组成

从1900年5月开始，帝国主义各国分别从在华军事基地、殖民地国家和国内抽调兵员，由军舰和运输船载运至大沽、塘沽，并进入天津租界。至6月10日止，进入天津租界的日、英、俄、法、德、美、意、奥八国陆军达三千余人。此后又陆续增兵，最多时总兵力达十二万八千余人（实际参战兵力约三四万人），装备火炮二百七十六门。各国军队的数额及编成情况大致如下：

英军两万余人。司令为盖斯里少将。其中有英国军官五百人，士兵五百五十人；印度军官六百人，士兵一万七千余人；海军陆战队一千二百余人。共编四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另有杂役团一万三千五百余人和向导一千三百余人。共约三万三千四百余人，随带火炮十四门、骡马两万余匹。

法军一万五千六百余人。司令为福里少将。共编两个旅：第一旅为本国驻军，下辖三个步兵团；第二旅为殖民地驻在军。另有海军陆战队四百余人。加上附属人员，共约两万人，随带火炮六十门、骡马一千六百余匹。

德军两万三千七百余人。司令为瓦德西元帅。计有本国常备军一万一千人，殖民地驻在军四千五百人，新征军七千人，编成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营，另有海军陆战队一千二百余人。共有火炮六十二门。

俄军两万人。司令为李涅维奇中将。由俄国的欧洲地区及东西伯利亚的驻军第二、五、六、七、九、十、十二、十五等八个步兵团、九个骑兵连、六个炮兵连等编成。加上附属人员，共约两万三千人，随带火炮四十四门。

日军两万二千余人。司令为山口素臣中将。主力是步兵第五师团的第九旅团（辖第十一、四十一联队）、第二十一旅团（辖第二十一、四十二联队），加上临时配属的步兵第十二联队，总计有五个步兵联队。另有骑兵第五联队、野战炮兵第五联队和第十六联队下辖的第一大队、工兵第五大队、辎重兵第五大队，以及临时派遣队的两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工兵中队。还有海军陆战队三百余人以及其它附属部队。共携带火炮五十八门。

美军五千八百余人。司令为沙飞上校。由美国本土及吕宋岛驻军编成三个步兵团（第九、十四、十五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营及一个炮兵连。另有海军陆战队约一千人。共携带火炮三十门。

意军两千余人。司令为伽略尼大校。由三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连、一个工兵排、一个辎重兵排编成。另有海

军陆战队六百余人。共携带火炮四门。

奥军三百人。司令不详。主要是海军陆战队一个营。

八国联军中，除日军第五师团是整建制外，其余多系临时抽调编成。出兵较多国家的军队，一般均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铁道兵、舟桥兵等兵种，还有电信队、汽车队、医疗卫生队（或野战医院）、野战兵工厂、粮秣供给队、氢气球队（英军和法军）、杂役队等勤务分队。

八国联军开始没有联合指挥部，作战时通过司令官联席会议分配任务。联军在北犯之前就酝酿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但因各国为争夺总司令一职相持不下，一直拖到1900年8月17日才勉强同意由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担任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迟至9月下旬才到达天津。

侵华联军都装备有当时世界上比较精良的步机枪和火炮。其中步枪的口径在六毫米半至八毫米之间，射程为两千米左右，枪重不超过五公斤，单兵可携一百至一百五十发子弹。机枪主要有马克沁、哈齐开斯、勃朗宁等，射程为两千米左右，每分钟发射四百至六百发子弹。火炮大部为中小型的野战炮和攻城炮。所有枪弹炮弹均使用无烟火药。各国军舰的攻击力、防御力、载重量、舰速、机动能力和续航距离等，比以前均有很大提高。

三、清朝的军事概况及兵力部署

甲午战争以后，清军总数虽逾百万，但能战之兵不多。其中有早已形同虚设的八旗兵二十六万人和绿营兵近六十万人，战斗力很差的勇营、练军十万八千余人，淮军三万余人，以及北京城内的神机营、虎神营等。北洋舰队覆灭后，海军没有恢复起来。戊戌政变后，慈禧为了加强京畿防御，委派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荣禄节

制北洋海陆各军。荣禄即奏请编组武卫各军。“以武毅军驻芦台为前军，甘军驻蓟州为后军，毅军驻山海关为左军，新建军驻小站为右军，别练万人驻南苑为中军”。武卫五军共约六万人，武器装备优于其它各军，编有步兵、炮兵、骑兵、工兵各兵种，初具合成军队规模。此外，清政府还命湖北提督张春发招募十营，编成武卫先锋左翼，江西按察使陈泽霖招募十营，编成武卫先锋右翼，以便声援京师。

武卫各军及淮军、练军主要装备近代枪炮。这些枪炮一部分直接购自国外，一部分由汉阳兵工厂及江南制造局用进口原料仿制。主要有毛瑟、马梯尼等步枪，克虏伯、格鲁森、阿姆斯特朗等厂生产的火炮以及仿制的中小型火炮。这些枪炮的射速、射程等主要技术性能，与侵华联军同种枪炮相差不远，但因枪弹炮弹大部分使用有烟火药，杀伤威力较差。

战前，在直隶、京津地区建筑的津榆、京津、芦保等铁路已经完工，可以用来调运军队。除铁路外，北京至天津、大沽、保定、山西、宣化、张家口、承德等地，都有质量不等的道路相通。此外，从通州至大沽，还可以经北运河、白河（今海河）运输兵员、军械、粮饷。同时，这一地区各府、州、县城之间，都有有线通信线路，并可与全国不少省城联系。全区各地还普遍设立了邮政局。所有这些，对于清军的兵力机动和改善作战指挥提供了条件。

战争爆发前夕，在直隶、京津地区的清军共有十一万三千人，其配置如下：

北京地区约六万五千人。荣禄自统武卫中军三十余营一万二千九百四十人，驻南苑；尚书衔武卫后军总统